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王光明

著



A Long Way to Go

Rural Changes in China, 1901-1949

乡路漫漫

上

20世纪之中国乡村 (1901~19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王
先
明

—
著

乡路漫漫

20世纪之中国乡村
(1901~1949)

①



A Long Way to Go
Rural Changes in China,
1901-19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章百家

副主任 牛大勇（常务） 徐思彦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 军	牛大勇	王奇生	王海光
邓小南	仲伟民	张 丽	张盛发
李丹慧	李剑鸣	杨奎松	汪朝光
沈志华	陈东林	徐 蓝	徐秀丽
徐思彦	章百家	彭 卫	韩 钢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在不断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 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 年 9 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但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以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 年 9 月

目 录

· 上 ·

导 言	1
第一章 辛亥前后的乡村社会变动	55
一 士绅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 与时代成因	55
二 辛亥革命与两湖乡村公产	78
三 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 时代性转折	99
第二章 乡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	124
一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回归	124
二 县政与村治之间：国民政府时期区级组织的演变	146
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的土地关系 与社会结构变动	163
第三章 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	194
一 私塾与学堂：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阙失	194

二 晋省乡村新学教育变革与调适	206
三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与民国乡建运动	229
第四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变迁	253
一 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253
二 近代铁路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272
三 近代铁路与乡村社会流动的新特征	320
四 从“对立”到“协同”：20 世纪前期城乡关系 论争的启示	327
第五章 近代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340
一 农村合作运动与小农经济变迁	340
二 20 世纪前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变迁	350
三 传统互助合作形式的改造问题	359
· 下 ·	
第六章 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变动	387
一 20 世纪前期山西的乡村雇工	387
二 华北乡村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	423
三 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社会	454
第七章 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471
一 从士绅到权绅的历史演变	471
二 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 华北的村庄领袖	504

三 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	518
四 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536
第八章 1930 年代的“农业恐慌”与乡村危机	552
一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	552
二 从《东方杂志》看乡村危机的社会关怀	566
三 “农业恐慌”：立足于历史成因与时代特征的考察	582
四 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	597
五 乡村社会冲突的演变及其对策	625
第九章 救治乡村：思想理论与历史实践	664
一 “以农立国”论的形成	664
二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	675
三 土地改革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与调适	694
四 晋绥边区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审视	712
第十章 百年中国乡村发展进程的历史启示	727
一 从革命走向建设：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	727
二 对 20 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建设路径的历史反思	756
主要参考文献	764
索 引	778
后 记	788

导 言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 20 世纪初年。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促使我们从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向方面进行思考。毋庸讳言，新的社会不平等尽管已经在社会分层中展现得十分明显，但是由城乡分离所形成的市民与农民的差别，正在成为更为深痛、更为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① 自 2000 年以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它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也曾经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努力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曾是 1930 年代思想界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论题之一。从不同角度探索和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将当代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 65 页。

“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向，也才可以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

一 “三农”问题的历史演进

20 世纪以来，在纷繁复杂的乡村社会发展理论论争进程中，形成了两大时期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轨迹。从 1901 年开始，“何以立国”的问题成为世纪之初社会思潮再次发生异变的征象。这一论题的展开和讨论一直延续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实践、实业救国及至维新变法的历史节点中不断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认同的社会思潮。然而，1901 年后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和“工商立国”论题再度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这场争论中，“农业立国”论一方似乎拥有更多的社会回应。在这场持续时间不短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是整个 20 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20 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解答。经过思想交锋的高潮和一度相对的沉寂后，1940 年代初这一议题纷争再起，构成论争的第二阶段。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的问题显然因应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已经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陷，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会为“农业立国”论提供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 20 世纪初争论的延续，是学者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探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历史时

期关于乡村社会发展的论争大致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政权建立伊始，建设的热潮和激情当然地纳入了“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既定模式之中。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此前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不能不被遗弃，但是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在19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迅速转入集体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1960年代前期，乡村变迁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主题展开的，讨论者主要以经济界为主，学术讨论气氛浓厚，各种问题可以自由辩论。19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自由学术讨论逐步消退，讨论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70年代，学术界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少数研究围绕着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农业学大寨、国营农场等主题展开外，更多地局限于政治性的宣传和灌输，学术性和思想性均无从谈起。

1978年后中国农村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在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彰显。无论是当初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讨论，还是最近几年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流转的争论，都浸透着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之道的探索，成为新时期中国学界和思想界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

伴随五四运动之后激烈的“主义”之争，中国学术思想界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主题经历了从抽象的理论之争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最终落实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经济研究上。三次论战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释中国的乡村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预设，但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释体系，并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社会历史进程。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社会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共同的认识。复兴农村路径与模式的分歧在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与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各不一致，从而使他们在选择切入乡村社会建设、改造与改进的路径时方式各异。但是正如晏阳初所言：“有志之士不但认识其重要，且在各处已由理论的探讨，转成实际的进行……其观点与方法容有差异，其在努力以求实现救亡复兴之宏愿，并无不同。”^① 思想交锋的激烈和理论主张的对峙构成了近代乡村理论论争的波浪起伏，但论辩中呈现的智慧和灼见却常常在思潮汹涌过后沉积为社会共识，成为时代选择和历史认知的财富。

从 20 世纪前期（1949 年前）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言说来看，无论论者持论所本如何、理据怎样，在几番思想的碰撞中也大都认同中国乡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向”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辩中最终被放弃，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 1940 年代“农业立国”与“工业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激烈，甚至相持不下，却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大论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和共识。农业立国派，或是新农本主义者在本质上完全与工业化主张的相一致。

1950 年代初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认识集中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负担等几个主要的问题上。但是，土地改革胜利后中国政府迅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广大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政界和学界

^①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1934 年 10 月），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 1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 307 页。

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在乡村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建言立说及其影响显然有限，他们的言论更多地侧重于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中共党内却在何时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引发了思想层面的激烈争论。尽管有政治变动的复杂和历史走向的曲折波动，思想论争的共识性成果已然顽强地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自己的力量。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聚合为人们的共识。农业现代化必须走技术进步的道路，既反映了国家需要解决农业发展中的现实困难，又需要适应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要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学术界的争论更多地集中在四个方面：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

而“三农”问题则成为新时期的社会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一个经典描述，尽管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认识。不同思想的论争或不同理论的辩驳，其实所面对的问题是同一的。当然，一个共识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即“三农”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三农”问题尤为重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有近13亿人口，62%以上生活在农村，占大多数；而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无从谈起。

二 时代聚焦下的历史思考

百年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论争在时而激越时而平缓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迹。不同社会、政治与学术背景的学者在观察乡

村社会以及设计中国社会发展路向的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基点与理论认知。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力图加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乡村社会的复兴。正是异见纷呈的理论、趋向不同的见解在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或者凝聚为社会共识，或者累积为理性资源，从而构成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乡村发展理论走向的思想前提。

历史沉积的思想成果富含着人类走向成功与希望的真知灼见！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许多论题虽然在物换星移中褪去了时代色彩，但有一些论题的思想魅力至今仍存，甚至在超越时代的局限中拥有了新的意涵。

当我们将问题呈现的镜头摇向历史时，顿然惊叹于历史惊人地相似！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破产”、“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成为举国至重的话题，到 21 世纪以来被广泛关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当代“三农”话语；从 1926 年王骏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到 21 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管时代条件不同，所聚焦的主题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如此一致的话语或命题背后却深伏着共趋性或同质性的深层致因。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提示，即“三农”问题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或乡村变迁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荒漠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生成的一个“发展问题”。“三农”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三农”问题不会凸显为时代性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社会问题，但是问题的呈现和表达不会如此集中在“三农”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的确显示了“三化”（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问题在于，是怎样的相关？如何揭示

二者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并寻求最佳的或最有效的协调方略？

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始终伴随着城乡背离式发展趋向前行，从而整体上的贫富差距在城乡之间成为一种显性社会不平等。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先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在 200 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不过 2% ~ 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反观我国的情况，在 1949 ~ 1979 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事实上农民成为低人一等的群体，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10% 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83 年的 33% 降低到 2005 年的 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分享了工业化的一点红利，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不景气加大了农民、农业、农村发展的难度。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与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研究收入分配的倒 U 形曲线的结论。

“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和时代特征，如果仅仅局限于现实的考量，或将既无法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恐也难以探寻到真正的求解之道。事实上，百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各种主张和方案，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区域实验与社会实践，其丰富与多样、繁难与简约，已经有着足够的样本意义和理论认知价值。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思想领悟！历史的选择和运行有着它既有的逻辑，因此有关中国乡村道路